

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考证札记

张可辉

(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, 江苏南京 210023)

摘要:自明初以来,一改元代海运为主、漕运为辅之政,以京杭运河为南北水路交通命脉,河运漕粮。清承明制,京杭运河及其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沿线城市、经济、交通、社会等等藉此融为一体。直至清末,漕运或有衰落,河道或有淤塞,而京杭运河的交通作用仍然足够突出,与此同时,沿线驿站随之设置,在传统邮驿与近代文报局、海关试办兼办近代邮政、大清邮政并存的时期,于沿线经济、社会发展仍然是重要维系。在京杭运河于2014年申遗成功和当前大力建设京杭运河文化带、加强运河文化传承保护的背景下,对于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站设置进行考辨,或能为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依据。

关键词:清代;京杭运河;水马驿站

中图分类号: G255.1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6—7973 (2021) 09—0155—03

明朝会通河浚通后,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,“南极江口,北尽大通桥,运道三千余里”^[1]。自明初以来,一改元代海运为主、漕运为辅之政,河运漕粮,于是京杭大运河日益成为明朝南北交通命脉,也是其漕粮运输、官宦兵丁与客商大贾往来的重要通道,诚如历史所载:“国计之有漕运,犹人身之有血脉,血脉通则人身康,漕运通则国计足”^[2]。

清承明制,京杭运河沿线仍然广置水马驿站,期间或兴或废,先后设置共计50余处。清朝京杭运河及其漕运“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,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有机的整体。”^[3]与前代邮驿相比,清朝京杭运河水马驿站仍然兼具水路与陆路功能,仍然是以传递政府文书和军事情报为主,同时也满足了来往官吏、商旅、驿卒于中途停歇、食宿、更换马匹、车船补给的需要。直至清末,京杭运河的发展日渐式微,但其交通作用仍然足够突出,而沿线驿站随之设置,在传统邮驿与近代文报局、海关试办兼办近代邮政、大清邮政并存的时期,在客邮“客观上刺激了近代中国邮政的发展”,又“在很大程度上侵夺了中国的邮政自主权”^[4]的情势下,于沿线经济、社会发展仍然是重要维系。

1 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设置概况

按地理位置,京杭运河习惯上被分作七段,即通惠河、北运河、南运河、鲁运河、中运河、里运河、江南运河,途经今北京通州至天津武清,历河北廊坊、沧州、

衡水、邢台,至山东德州、临清、聊城、济宁、滕州、微山,复经江苏徐州、宿迁、淮安、扬州、镇江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,至浙江嘉兴、湖州,最后达于杭州。

清代京杭运河沿途所置驿站,多为兼具水路、陆路功能的水马驿站。清代驿站之间距离设置,多承明制,以60里为准。有研究据明人黄训《名臣经济录》等史料考证指出,明代京杭运河“两相邻驿站间的里程为60里的最多,70里的位居其次,其平均里程是71.4里,这既便于船只更换,又便于人员的休整与安顿”^[5],时至清代,京杭运河水马驿设置也大略如此。

《清代驿站考》可谓迄今为止大陆地区关于清代驿站最为全面的研究成果之一,为学界乃至社会了解清代驿站设置情况,提供了重要参考。其驿站考证以清代区划为限,兼及水路驿站的路线、里程。考证指出,“由京城之东的通州沿运河南下,可至山东、江苏苏州和江宁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各省省城。”^[6]其中,京杭运河沿线水马驿自北向南,计有通州潞河、通州和合、武清河西、武清杨村、天津杨青、静海奉新、青县流河、青县干宁、沧州砖河、南皮新桥、吴桥连窝、德州良店、德州安德、德州梁家庄、武城甲马营、临清渡口、清州清源、清平清阳、聊城崇武、阳谷荆门、东平安山、汶上开河、济宁南城、鱼台河桥、沛县泗亭、峄县万家、邳州赵村、宿迁钟吾、扬州仪征、元和姑苏、杭州武林诸驿。两驿之间的距离,近则为40里,远则为80里、90里,甚至110里至120里,然以60里、70里为常。

2 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可考数量

自明朝初年开始,即于京杭运河按一定距离大量设置水马驿站。与明代相较而言,清代京杭运河沿线水马驿设置或有革废,所考者至少有50余处。

其一,《明宣宗实录》记载,“通州至仪真,视水路路程远近增置之。宜盖通州至仪真驿,俱洪武永乐中所设,路程无甚相远,惟通州杨村至扬青,山东梁家庄至甲马营,开河至济宁州南城驿,比之他驿稍远”^[7]。

又,明人程春宇《士商类要·水驿捷要歌》记载:“试问南京至北京,水程经过几州城。皇华四十有六处,途远三千三百零。从此龙江大江下,龙潭送过仪真坝。广陵邵伯达孟城,界首安平近淮阴。一出黄河是清口,桃源才过古城临。锤吾直河连下邳,辛安房村彭城期。夹沟泗亭沙河驿,鲁桥城南夫马齐。长沟四十到开河,安山水驿近张秋。崇武北送清阳去,清源水顺卫河流。渡口相接夹马营,梁家庄住安德行。良店连窝新桥到,砖河驿过又乾宁。流河远望奉新步,杨青直沽杨村渡。河西和合归潞河,只隔京师四十路。逐一编歌记驿名,行人识此无差误。”^[8]

按:龙潭驿,马驿,治今江苏南京栖霞区西北,清时属南直隶江宁府句容县,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卷七四《江宁府二》载曰:“在句容县盘龙山北。”《清代驿站考》引《嘉庆大清会典事例·兵部·邮政·置驿二》载曰:“龙潭驿,马二十五匹,马夫十五名,差夫一百二名。”城南,一作南城,治今山东济宁城区,《清代驿站考》引《雍正山东通志》卷十七《驿递志》考曰:“南城水马驿,在(济宁)州南门外,驿丞管理。”夹马营,一作甲马营,治今山东德州武城县甲马营乡,《清代驿站考》引《嘉庆大清会典事例·兵部·邮政·置驿一》载曰:“甲马营驿,水驿夫一百六十一名。”

又,《士商类要》刻印于天启六年(1626年),根据其记载,这一时期,自南京出发,不计龙潭驿,沿京杭运河北上达于北京,所历水马驿共45处。后世或革或改,至弘治年间,此线水马驿所存计38处。鲁桥、长沟、卫河、直沽4驿,《明朝驿站考》引成书于弘治十五年(1502年)《明会典》所载,此间已革。张秋,一作章邱,又作章丘,治今山东济南章丘区,后改义仓。《道光章邱县志》卷二《建置》载曰:“旧在县治西南,今改义仓。”辛安、直河,嘉靖年间(1522-1566年)

改为镇。《乾隆江南通志》卷二十六《舆地志·关津二》载:“直河镇,邳州东南六十里。明初,置直河驿,嘉靖中改置”;辛安,一作新安,治今江苏邳州邳城镇洳口街道,同卷载:“新溪镇,(邳)州西六十里,滨河接睢宁界。明初,置新安驿,嘉靖中改置。”

其二,据黄汴《一统路程图记》卷一《北京至南京、浙江、福建驿路》所载,从南京出发,自龙潭驿始,沿京杭运河南下,历经丹徒京口驿、丹阳云阳驿、吕城驿、武进毗陵驿、无锡锡山驿、吴县姑苏驿、吴江松陵驿、吴江平望驿、秀水西水驿、崇德皂林驿、钱塘武林驿,至于杭州^[9]。

按:《一统路程图记》撰于隆庆四年(1570年),存吕城、松陵2驿,然据《明朝驿站考》引成书于弘治十五年(1502年)《明会典》所载,此间吕城、松陵2驿已革。应是《一统路程图记》存其地名地址,而实际并未使驿。此线计水驿9处,结合《士商类要》所载水马驿兴废,至弘治年间,存47处。

其三,弘治元年(1488年)朝鲜崔溥来华,自浙东走陆路至杭州,自杭州走水路至北京,“自武林驿过吴山(此间为水路中之陆路)、长安、皂林、西水、平望、松陵、姑苏、锡山、毗陵、云阳等驿至镇江府京口驿”,“自京口驿过扬子江(长江)至扬州府广陵驿”,“过邵伯、孟城、界首、安平、淮阴、清口、桃源、古城、钟吾、直河、下邳、新安、房村、彭城、夹沟、泗亭、沙河、鲁桥、南城、开河、安山、荆门、崇武、清阳、清源、渡口、甲马营、梁家庄、安德、良店、连窝、新桥、砖河、乾宁、流河、奉新、杨青、杨村、河西、和合等驿至通州潞河水马驿。”^[10]

按:崔溥所记,自武林至潞河,驿站共55处。其中,吴山为陆驿。长安驿,据《乾隆浙江通志》卷八十八《驿传上》载:“在(海宁)县西北二十里。唐贞观五年置桑亭驿,八年改义亭驿,宋因之,元设水马二站,至元间改长安水驿,明革。”鲁桥、松陵2驿已革,直河、新安2驿已改为镇,所考见上。然又兴有开河、荆门2驿。

据此统计,至弘治年间,京杭运河所存水马驿至少有50处可考。清代一度沿用上述诸驿,或至康乾时期,或至清末,《清代驿站考》对此皆有所考。其中沙河驿考,可参考“榆河驿”考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十一《北直二》载,沙河“即榆河也”。另,彭城、泗亭、夹沟、

桃源、仪征诸驿考证分别置于“榆河驿”、“铜山县铜山夫厂”、“沛县泗亭夫厂”、“邳州赵村驿”、“桃源县桃园驿”、“仪征县并水驿”名下。

3 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始设时间

关于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始设时间问题,嘉庆朝《清会典》、《清会典事例》、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等典籍文献是用以考证的重要史料基础。除此之外,清人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(贺次君、施和金点校本,中华书局2005年版)、明人陈循、彭时纂修《寰宇通志》及《乾隆大清一统志》等史料文献也有特别的记载,对于部分驿站始设时间或沿革可考者,略作考证,以备查询。

(1) 彭城驿:《乾隆大清一统志》卷六十九《徐州府》载:“在铜山县东黄河西岸。旧本在城南二里许,明正德中圯于水。嘉靖二十二年徙于此。旧有驿丞。本朝雍正十三年裁。《寰宇通志》卷二二、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二九存史事。”

(2) 邳州赵村驿:《乾隆大清一统志》卷六十九《徐州府》载:“在邳州南新沭口下。明万历四十四年置,南通直河口,北接韩庄闸。今有驿丞。”

(3) 西水驿:《乾隆浙江通志》卷八十八《驿传上》:“元初置,至正末毁於兵。明洪武元年四月,除授站提领为驿丞,明末毁。国朝康熙十一年知府王師夔重新之。”《寰宇通志》卷二四、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九一存史事。

(4) 皂林驿:《乾隆浙江通志》卷八十八《驿传上》:“嘉靖甲午御史張景以驿去府治不一站,長安驿偏迂,乃度中置。”《寰宇通志》卷二四、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九一存史事。

4 结语

有清一代,京杭运河的兴废变化也有其特别性,漕运或有衰落、河道或有湮塞,与其相互影响。清朝京杭运河的兴废既与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地形变迁有关,也与政府漕运政策及其方式的变化相联,对于沿线城市及其经济、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。2014年,京杭运河申遗成功;2020年11月14日,南京博物院举办“大运河博物馆联盟”成立活动,大运河沿线32家博物馆共同提出了“高质量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”的发展规划,在如此大力建设京杭运河文化带、

加强运河文化传承保护的背景下,对于清代京杭运河水马驿设置进行考辨,或能为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依据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(清)张廷玉. 明史:卷八五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2] (明)明穆宗实录:卷六八[Z]. 台北: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2.
- [3] 叶美兰,张可辉. 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[J]. 南京社会科学,2012(9).
- [4] 金燕. 英国邮政改革与社会变迁[M]. 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0:253-254.
- [5] 岳广燕. 明代运河沿线的水马驿站[J]. 聊城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0(2).
- [6] 刘立鹏. 清代驿站考[M]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7:9.
- [7] (明)明宣宗实录:卷一一三[Z]. 台北: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2.
- [8] (明)程春宇. 士商类要//杨正泰. 明代驿站考·附录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:293.
- [9] (明)黄汴. 一统路程图记//杨正泰. 明代驿站考·附录[M]. 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:207.
- [10] 葛振家. 崔溥《漂海录》评注[M]. 北京:线装书局,2002:7.

基金项目:南京邮电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申报培育课题“中国近代邮政电信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”(GPY219002)。

